

对及民主的抗争

转套



对反民主的抗争

杨奎

目次

美國政治顧問與中國政治	(一)
當前的主要任務	(七)
對蘇聯的態度問題	(一一)
反民主的幾種煙幕	(一八)
國際友人對中國民主的熱望	(二六)
揭穿妨害民主的幾種論調	(三三)
國父對蘇聯的態度	(四〇)
爲貫徹抗戰國策而奮鬥	(四六)
民主陣線中的蘇聯	(四九)
言論自由與民主政治	(五六)
實現民主的普遍要求	(六一)
一黨專政與以黨治國	(六八)

中蘇文化的交流·····	(七五)
法西斯作風的罪惡·····	(八二)
從三國同盟到美日談判·····	(九〇)
三十年前的民主運動·····	(九七)
中國民主的一般性·····	(一〇四)
民主同盟與中國民主·····	(一一一)
中國民主的特殊性·····	(一二八)
重新引起注意的參政會·····	(一二五)
關於參政會的回憶與感想·····	(一三二)
中山先生的偉大精神·····	(一三九)
民意機關的組織與職權·····	(一四三)
訓政約法與抗建綱領中的民主權利·····	(一五〇)
鄧演達先生的精神不死·····	(一五八)
政治上的學習精神·····	(一六一)
太平洋問題與中國·····	(一六八)

美國政治顧問與中國政治

一 拉第摩爾的生平與主張

最近蔣委員長接受美國羅斯福總統的推薦，委任拉第摩爾（Owen Lattimore）為政治顧問，引起了國內外的特殊的注意。要研究這位美國政治顧問對於中國政治可能發生甚麼影響，首先要略述他的生平與主張。

拉第摩爾現年四十一歲，美國哈佛大學畢業，他的父親曾在中國南洋及北洋二大學擔任教授，在中國致力教育近二十年，所以他在童年時代即在中國達十二年之久。自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六年間，他曾在上海北平天津等處參加新聞界工作，隨後曾在中國邊境滿蒙新疆等處作廣泛的遊歷，將視察所得，寫作文章發表。他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三七年的大部分時間仍留在中國。因此他能說非常流利的中國國語，他最近對人說，他這次來華，不像出國，只像回鄉。他又曾為太平洋學會做了許多時候的研究和寫作工作，現任美國約翰霍布金大學教授及太平洋問題雜誌主筆。他常有關於遠東及中國問題的

文章發表於美國各雜誌如 Amerasia 及 Foreign Affairs 等等，被視為遠東及太平洋問題專家。他曾任蔣委員長的政治顧問，將於本月八日單身自美乘飛機經港赴渝，他的夫人及一個十歲的孩子仍留在美國也爾偕摩爾。

拉第摩爾被稱為『對於中國人民有充份的知識，同時對於中國抗戰有深切的同情』。依他最近發表的對於中國抗戰及中國政治的主張，我們認為他對於中國確有正確的認識，對於中國抗戰確有深切的同情。

我在這裏特別要指出三點：第一點是他重視中國於國共二黨以外的廣大中間層的廣大力量。他說對中國有一個最重要的認識，就是有千百萬的中國人，並不是任何政黨的黨員，他們只是被『民族獨立』和『民主共和國』的要求所團結攏來的。任何政黨要在形式上統治人民是無濟於事的，必須取得大多數人民的信任，這種信任的取得，不能由於威力強迫的服從，而只能『取得同意』，這個事實保證了中國必須採取民主之路。因此民主政治在中國的重要性，成為拉第摩爾的第二點主張。他最近對美國記者談話，也提到『中國是為着獨立的民主而奮鬥』。這和上面說的可以互相參證，就是他認為大多數的中國人只是被『民族獨立』和『民主共和國』的要求團結攏來的。第三點是他特別重視中國的民族統一戰線。他認為今日中國如果造成內戰，那是日本和德國所渴求的。他認為只有真誠擁護中國的民族統一戰線，才能達到打倒日本，爭取中國的民族獨立。他認為友邦的援助，無論來自蘇聯或來自其他民主國，都須注重中國的民族統一戰線，才能收到良好效果。

上述的意見，都可在拉第摩爾在今年四月出版的 *Foreign Affairs* 中“*Stalemate in China*”一文裏可以看到。重視廣大中間層的廣大力量，廣大中間層的信任之取得，必須由於事實上的表現能得人心，而不能由於威力強迫的服從。重視民主政治在中國的重要性，重視中國民族統一戰線，認為破壞中國的民族統一戰線是與日德有利，真誠擁護中國民族統一戰線，是中國打倒日本及爭取民族獨立的基本條件。關於這三點的看法，我們和拉第摩爾具有同感。

這至少是到現在為止，我們在拉第摩爾公開的言論中所能看到的他對於中國政治及抗戰的態度。他做了政治顧問之後，有沒有什麼其他變化，我們在今日當然還無從知道。

二 美國的用意

據電訊所傳，華盛頓政界對於拉第摩爾被任為蔣委員長的政治顧問，甚為重視，因為這是由於羅斯福總統的推薦，而且是蔣委員長第一次接見美國元首的推薦而委任的政治顧問。美國輿論界也鄭重指出，這個委任表示美國對於中國抗戰有着深切的關懷。

美國對於這件事的用意，大概不外二點：第一點是對於中國的內部情形可有一人經常加以注意，使美國得到更詳確的材料，使美國對於中國可以得到更清楚的了解。第二點是對於中國政治的改善，可有一人經常有所貢獻，由此可以加強中國抗戰的力量，使美國在特別注意大西洋的時期，太平洋方

面有着一個相當堅強的安定力量，可以相當減少它的東顧之慮。這一種任務，本來美國的駐華大使也未嘗不可略盡責任，但是正式的外交官，究竟有其限度，不如一個半外交式的政治顧問比較便利得多。美國華盛頓郵報指出拉第摩爾是最適宜的人選，不但因為他熟悉中國情形，而且能說一口流利的中國話，可以直接和蔣委員長談話，不像其他顧問需要翻譯。這誠然也增加了這位政治顧問的便利之又一點。

但是尤其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美國在我國抗戰四年，正踏上更艱苦奮鬥的階段，由美國總統鄭重推薦了一位政治顧問到中國來。（這個地方的『政治』二字，值得特別加重。）美國不久以前派了特使寇里來，後來不久又派了經濟專家福克斯來，最近又派了技術專家來協助中國整頓演繹路，又派了飛機師及運輸飛機到中國來。除了這些以外，還嫌不夠，還要注意政治方面，鄭重推薦一位政治顧問到中國來。據說『觀察者皆信此為中美間不久即將實行若干進一步合作的重要計劃表示』。此語果確，在『即將實行若干更進一步合作的重要計劃』以前，援助中國抗戰的友邦也很親切地想到中國的政治問題。有些人認為中國今日的抗戰，只須有飛機大炮就行，什麼都不必談，什麼都等到抗戰勝利以後再說。外國的學者和政治家似乎和我國的這些人有着很不同的意見。英國的拉斯基教授對於正在激烈抗戰中的英國大呼『舉行政治上大改革』，大呼『加深並擴大民主的政治的領域』！（見拉斯基在 New York Times, Oct. 20, 1940 所發表的『英國政治改革與勝利的聯繫』一文）現在美國爲着要加強我國在遠東拖住日本的泥腿，也想到了我們的政治，這不是很可深思的嗎？依上述某些人的意見，

這位美國政治顧問，大可在中國抗戰勝利以後來！

三 實際的影響如何

根據拉第摩爾已往所表示的態度，根據美國現在還需要支持中國的抗戰，我們當然希望這位政治顧問對於中國能發生良好的影響，但是主觀的希望是一件事，客觀的實際發展是另一件事。我國的何部長會對美國廣播，說中國是一個『民主國家』，這在我們每一個中國人，當然感到不勝榮幸之至（！），但是同時我們却也要想到掛的是『民國』的招牌，在政治上的實際做法怎樣，倒也值得我們的慎重的考慮，不要使這位政治顧問在相反方面，『得到更清楚的了解』。

在另一方面，這位政治顧問雖懷着『滿腹經綸』，不遠萬里而來，究竟對中國政治能够發生怎樣的影響，最大部分還是在中國自己方面，如在中國自己方面仍是『諱疾忌醫』、『故步自封』；那不要說一個拉第摩爾無可奈何，就是有着十個一百個拉第摩爾有何用處？最顯著而又最新的例子是最近來到中國的中美平準基金委員會美籍委員福克斯，在全國財政會議公開發表演說，認為經濟問題的解決不僅限於經濟的範圍，同時要連帶牽連許多問題，如『通貨膨脹，物價高漲，紙幣增發，糧食缺乏，軍用品和人民用品增加生產的需要，運輸的困難及徵稅計劃，政府度支等等問題』。他更婉轉而却嚴正地指出：『至於人員的登庸必須以才能為唯一的根據，而不能根據其人的政治關係或社會地

位』，『關於預算的管理必須有一組織完善和統一制度。政府財政的完全公開，乃民主改良的必要特點。』在福克斯到中國未久，也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了，但是他這些話實際的影響怎樣，實在令人難於判斷。

拉第摩爾的光臨，至多也只能做到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罷，但是中國政治到了目前的情況，政治機構和人選非有基本的改革，政治作風乃至政策非有基本的改革，要由於一個客卿的幾句話，希望收到怎樣大的效力，那是不易想像的奇蹟！我們在主觀上固然存着殷切的希望，但在客觀上也必須面對事實，如果徒作幻想而不面對事實，不免發生更大的失望。

當前的主要任務

『七七』四週年紀念的光臨，給與全國愛國同胞以莫大的歡欣和興奮。回憶四年前的今日，日本帝國主義者倡言只須三個月就可以亡整個的中國，國內的失敗主義者及妥協主降的份子也附和着他們的高見，認為中國和日本打，無異以卵擊石，非亡不可，即國內的有些動機並不算壞的所謂軍事家，至多的估計，也只認為中國對日的抗戰可以支持六個月至一年。但是現在如何？中國整整的打了四年的仗，仍在繼續堅持着抗戰，不但粉碎了我們民族敵人和民族敗類的幻想，而且也驚醒了有些軍事家，使他們對於中國的潛在的偉大力量有了正確的認識。

中國在已往四年中的光榮的抗戰之所以得以繼續支持，是靠着這潛在的偉大力量得到若干程度的發揮，雖則還只是局部的發揮。如果把中國的潛在的偉大力量視為中國的無限的寶藏，這寶藏在實際_上還只是被發掘了一小部份，而且是在一部份當權者很不願意，甚至多方阻撓的情況下被發掘出來者。在這四年來的抗戰過程中，在初期的階段，民主政治有過初步的發展，民衆動員有過初步的蓬勃的氣象，抗戰的宣傳和文化工作有過初步發展，這種種方面配合着前線英勇戰士的再接再厲，使中國的潛在的偉大力量在『全民抗戰』，『全面抗戰』的迫切要求之下得到若干程度的發揮，由此能在種

種困難之下支持了這四年來的光輝戰績。

但是我們總還記得，『唯武器論』自抗戰已在實際開始之後，仍在繼續散播它的毒菌。我們不否認武器在抗戰中的重要作用，我們在抗戰過程中當然要盡可能取得精密的武器，以加強我們的抗戰力量，但是『唯武器論』者却是主張中國的抗戰只須有武器，此外如內部政治的改善，民衆動員的加強，抗戰宣傳及文化工作的邁進，及其他配合軍事上需要的種種方面，一概都可以不要。在抗戰爆發以前，他們用『唯武器論』來阻礙抗戰的發動，在當時他們公開倡言中國的武備要進步到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武備一樣，除對日本『和睦邦交』，別無他圖。抗戰爆發以後，他們仍用種種方式播散着在本質上是同樣的毒素。舉個明顯的例子，你說民主政治實現能加強國力，加速抗戰勝利的到來嗎？他們就囂然起來反對，說抗戰時期唯一的事情就是打仗，民主政治不是抗戰時期所需要的。他們把長期的反侵略的戰爭看作是一件極簡單的事情，好像只要拿着一把刀在數分鐘內殺死一個人那麼簡單，除一把刀外，一切都不需要！次殖民地對於帝國主義者侵略的反抗，它的最後勝利就靠它在抗戰過程中繼續不斷地新生力量，這個基本的認識，更是他們所不願承認的。在另一方面，真誠擁護抗戰國策的人們，真誠要貫徹抗戰國策及爭取最後勝利的人們，便在種種壓迫的情況之下，努力增進一切可以增強整個國力及配合軍事上之迫切需要的政策，督促這種種進步政策的實現。

由於上述的實際形勢的存在，中國的潛在的偉大力量只得到局部的發揮；中國無限的寶藏只被發掘了一小部份。今日逢到『七七』四周年的光榮紀念日，我們一方面感到歡欣和興奮，因為在這四年

來我們已在堅苦的情況之下支持了抗戰國策，國家的命運，沒有被妥協主降份子斷送；但是在另一方面，我們仍然不免深深地感到這四年來不能有着更光輝的戰績，不能有着更偉大的表現，因為中國的潛在的力量只是得到局部的發揮，中國的無限的寶藏還只是被發掘了一小部份。這是有待於全國愛國同胞的更大努力與推動的。

抗戰到了今天，還有些人在那裏散播着『新唯武器論』的毒素，他們說現在只要飛機大炮打仗就夠了，什麼都不必談，等到抗戰勝利以後再說。我們誠然要更多的飛機大炮，但是我們所要指出的是僅僅有了飛機大炮還不够，我們必須同時努力內部政治的改革，然後國力才能加強，然後我們才能有利地運用更多的飛機大炮，為國家民族爭取自由解放。

我們擁護『軍事第一』，『勝利第一』，但是我們要注意怎樣能使『軍事』真能達到『第一』，怎樣能使『勝利』真能達到『第一』。這就不能僅僅有了飛機大炮而解決一切了。國內的貪官污吏橫行，（被檢十字）大發其國難財，影響到一般人民及前線士兵的生活，影響到戰費的籌措，這是可以飛機大炮來解決的嗎？隱藏在抗戰陣營中的妥協主降份子，配合着敵人漢奸的願望，盡其挑撥離間的能事，企圖引起內戰，以分散我們集中全力於禦侮，這可以用飛機大炮來解決的嗎？有些人在文化工作上儘開着倒車，壓迫進步的青年，摧殘進步的文化，消除愛國人民對於抗戰建國的貢獻，削弱整個抗戰力量，這可以用飛機大炮來解決的嗎？這種種和抗戰最後勝利有着直接間接的關係的事情，是否都可以等到抗戰勝利以後再來糾正與改善？抗戰最後勝利又怎樣可以加速到來？

一向志在阻礙抗戰的『唯武器論』又在以新的姿態出現了，我們當前的主要任務是要粉碎『新唯武器論』的陰謀，加強政治革命的要求，以配合新的軍事形勢的迫切要求，增強整個抗戰的力量，加速最後勝利的到來。

對蘇聯的態度問題

在德蘇戰爭爆發以後，除了德國統制下的小嘍囉及某些國家裏仍然固執着對於蘇聯的怨恨而把自己國家民族的利益寧願因此拋棄不顧的人們，最大多數的同情無疑地是全在蘇聯方面。即英國首相邱吉爾，一方面儘管公開宣言：『二十五年來沒有誰比我反共產主義更澈底了，我不收回我所講過的反對共產主義的任何一句話』，在另一方面却也坦白地說：『但是面對着在我們眼前展開的繪卷，這一切都消逝了。』從此就聽到他說了不少要援助蘇聯的話，再沒有聽到他說一句反蘇或責備蘇聯的話。又例如美國副國務卿韋爾斯，一方面儘管公開宣言：『德國和蘇聯政府都是不讓他們的人民有信教自由的，對於美國人民，這些以及其他共產主義專政的教條正如同國社黨專政的教條一樣不能忍受，一樣和他們的信仰相左』，但在另一方面也坦白地說：『不過當前的現實問題是國社黨所拚命追求的獨霸世界，奴役所有民族和毀滅民主國家的計劃不能有效的被擋住和被打敗。』韋爾斯把蘇聯的主義和德國的納粹主義等量齊觀，是否正確，非本文範圍所欲討論，在這裏所要指出的是韋爾斯如同邱吉爾一樣，公開宣言是始終反對共產主義的，也就是以前確是反蘇的，但現在（指德蘇戰爭爆發以後）却要暫時不算舊帳，主張援蘇，在事實上也沒有再聽到他們今天來一篇反蘇的文章，明天來一篇責蘇的

談話。德蘇戰爭爆發於六月廿二日，邱吉爾和韋爾斯的上述的演詞和談話都發表於六月廿二日，足見他們反應的敏捷。他們的這樣態度的改變，能說他們是採取了『蘇聯至上』主義嗎？能說他們拋棄了英國或美國的立場而是『爲着蘇聯的利益』嗎？我想略有頭腦的英國人或美國人是不會這樣看法的。以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家，看到了爲着本國當前的利益而對於蘇聯毅然擱開舊怨，採取友好的態度，我們不能不佩服他們的眼光如炬罷。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能進而討論中國對蘇聯的態度，但是在我們討論中國對蘇聯的態度以前，我們要先談談蘇聯對中國的態度。

一 蘇聯對中國的態度

蘇聯對中國的態度可從蘇聯同情和援助中國的抗戰看出來。英美蘇都是同情和援助中國抗戰的友邦，但迄今爲止，蘇聯仍是援助中國最多的一個友邦。自中國抗戰以來美國給中國的借款實際上共爲一萬七千萬美金，英國給中國的借款實際上不到一萬萬美金，而蘇聯給中國的借款共達三萬萬美金。且在中國抗戰後，借款給中國最早的是蘇聯，最爽快的也是蘇聯。（例如美國於今年四月正式簽訂的中美平準基金及購貨信用借款，其實在去年十一月即已決定，直延到今年四月廿五日始行簽字。）我們對同情和援助中國抗戰的各友邦，當然都感謝，當然都珍視，但是在實際上對我國抗戰同情最切援

助最多的友邦，我們却也不可不知道。我們的『官報』或『準官報』，對於英美借款特別樂於表揚，對於蘇聯借款往往諱莫如深。我們不反對表揚，但對於諱莫如深却頗難索解。但是某些要人在國外却有時於無意中流露出一些，例如孫哲生先生於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一日在倫敦發表談話，就說到『蘇聯給與我們的援助與軍械，實較其他各國爲多。』前駐英郭大使說得更具體：『中國自蘇聯方面獲得的物質援助，較之他國方面合併所得者尤多。』（見一九四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上海大美晚報）蔣夫人在美國自由週刊（Liberty）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去年十二月廿一日），也說到『智識份子的忠實，迫得我不得不說出中國抗戰三年來，得自蘇聯的物質援助，實較自英美方面獲得的總和多至數倍。』

此外我們聽到孫哲生先生在國民參政會留渝同人談話中關於他數次在蘇聯親眼看到蘇聯對中國抗戰的熱烈態度，尤令人感奮。蘇聯借給中國的三萬萬美金是分四次借的，頭三次哲生先生都參加過。他說在『八一三』抗戰的前夜，其他友邦對中國抗戰都抱着多少懷疑態度的時候，當時在南京的蘇聯大使慨然表示蘇聯對中國抗戰的信念，自動表示可以借款相助。第一次借款爲五千萬美金，當時因戰備急迫，條件不及談，文書不及寫，簽字手續都不及做，蘇聯不顧這些，只要中國開一個單子，開明所需要的東西，他們就趕緊照辦，打破了向來國際上訂定借款合同先例！後來用過了原額，第二次借款（約在廿八年二月），又借五千萬美金，於簽訂第二次借款合同同時，才順便完成第一次借款的簽訂手續。到廿八年八月間，看看需要作第三次借款，哲生先生再親自跑到莫斯科，他想這一次要多借一些，準備對蘇聯當局說出許多中國抗戰的重要和需要某些軍械迫切的情形，蘇聯當局聽不到一半，